

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李玲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符合党中央为之确定的“两屏蔽、两基地、一通道、一前沿”的基本定位。同时,西藏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应具有自己的指导理论,要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规模范围理论、校正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理论、区域合作理论以及地缘政治理论加以很好地运用。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要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双重安全、绿色发展、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融入中国版全球化等多重目标。

关键词 西藏;“一带一路”;理论;现实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18.04.002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18)04-006-006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弘扬人民友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3日,在赴印度尼西亚参加峰会时,他又发表了《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演讲,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提出。2015年3月28日,在习近平主席博鳌论坛发表演讲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表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进行了官方阐释。同年7月21日,“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推进会议正式划定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走廊作为今后“一带一路”的重点推进方向。新疆被确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福建成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云南成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

心;陕甘宁青成为了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和商贸物流枢纽,以及重要产业与人文交流基地;广西被确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北京、内蒙古和东北三省则成了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沿海诸城市成为了“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如此看来,“一带一路”似乎与西藏没有什么关系,西藏并不需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其实,“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倡议与战略,它是全球化的中国版本,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新全球化方案。^[1]实践也正是如此,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的西藏战略定位是“两屏四地”,即西藏是祖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是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 and 世界旅游目的地。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将

收稿日期:2018-10-02

作者简介:李玲艳,女,汉族,辽宁大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藏学。

西藏的战略定位调整为“两屏两地一通道一前沿”,即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同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以及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调下“两地”,调上“一通道”“一前沿”,看似微小的调整,其实是党中央对西藏战略定位的重大调整,希望西藏用开放的眼光看待发展。西藏不仅承担着自身的改革开放任务,还关乎整个国家在中国版全球化中的角色定位,已经成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的一环。

一、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源于现实的要求

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应以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为指导,重点做好“两屏障、两基地、一通道、一前沿”建设,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契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一)服务国家安全需要

有学者认为:“西藏在安全性和国防战略方面具有特殊地位,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西藏在国家整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达赖分裂主义势力,以西藏地缘优势来为他们各自国家的国际战略利益服务。”^[1]事实也正是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阻滞中国的快速发展,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中国,“西藏问题”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利用中国与印度等国历史上形成的领土分歧,阻滞中国与南亚国家形成区域经济方面的一体化;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阻止中国打通经由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增加中国进出口货物的运输成本;利用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通过达赖集团的鼓噪,实现分裂中国的目的。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上述问题都难以在现有的框架内得到圆满的解决。二战期间,作为印度宗主国的英国就曾建议美国:“承认西藏有同其他国家交换外交代表的权利。”只是美国基于打赢战争的考虑而没有同意。在地缘政治方面,国内学者也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对华政策上,经济界的声音超过安全和战

略界的可能性不大。”^[2]在达赖身后,“流亡藏人团体中不赞成十四世达赖所谓‘中间道路’的人可能对我国采取军事斗争手段,可能会产生恐怖主义威胁。”^[4]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涉及“西藏问题”的国家安全问题,很难借助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得到妥善解决,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经济观,用全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才能解决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这种新的世界关系框架,就是全球化的中国版本“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新国际关系。

(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英国媒体曾经说过:工业化的英国为人类创造了供给,崇尚适度浪费的美国为世界带来了消费模式,而今中国要引领世界潮流,就要给人类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范式。可见,绿色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西藏是世界屋脊,是真正的世界第三极,在其独特的土地之上,生长着诸多稀有的物种,为人类保留着多样性的生物基因,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经过自然界多年的磨合,已经形成了诸因素作用平衡的生态系统,成为了祖国内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而今,由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和国家间区域发展战略的不协调,以西藏为基础的高原生态系统面临着恶化的风险,而且,在现有的国际关系框架下,难以协调不同国家,使区域生态回到可持续的初始状态。这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模式,协调相关国家的利益诉求,来保护高原生态系统,维护好国家的生态安全屏障。这种新框架的建立,就寄希望于“一带一路”倡议。

(三)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

人类社会虽然已经步入了信息化社会,但也并不是说完全不需要实体经济了,更不能说不需要任何实物性经济资源。只是我们要重组价值链与产业链,减少流通环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发展对资源的耗费。其实,在信息化时代有些战略性资源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形成还是至关重要的。西藏作为世界屋脊,自然环境十分独特,在形成不可再生资源方面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比如,西藏硼矿石储量巨大,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能源资源

储量的探明,也有巨大的前景;水资源极其丰富,且河流落差巨大,拥有能量转换的巨大潜能,可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能源支撑。然而,目前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对战略资源的运用能力有限;加之我们对高原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还在进行当中,并没有形成最终的结论。为此,为了实现西藏以及全国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目前还要保护好战略性物质资源,供子孙后代使用。今天发展西藏经济,主要还应立足中国版全球化“一带一路”,通过次区域内的互通有无,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今后战略性资源的运用创造有利条件。

(四)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需要

中华民族的来源是多元的,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这才让中华民族充满生机活力,才使中华民族不断地发展壮大,实现伟大的复兴。西藏作为一个独特的高原区域,其文化具有独特性,是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重要的一支,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与内地交往相对困难。而今中国版本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恰恰为西藏创造了契机,因为“一带一路”既包括向外的开放,也包括向内的开放。在“一带一路”坚持的“五通”原则中,包括民心相通,也就是我们与周边相邻国家互联互通的过程中民心相通是必要的条件。这种民心相通就是文化的相互包容与理解,这将加大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同时,为了在经济活动中赢得优势,又得强化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这就使得中华文化的一体性得以强化。这种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是现实版全球化难以做到的,只有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才能实现。

(五)适应新型全球化的需要

有学者认为,1648年维斯特法利亚和约签署以后,国家领土主权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国家边界空间形态的演化受到国际法的限制。但是,人类本质上具有不断拓展经济行为空间的需求,在其领土空间控制的范围受到约束。^[9]与此同时,格劳修斯认为:“根据自然,海洋似乎是抵制所有权的。”“我们称之为头等重要的法则或首要的原则,其精神不证自明且永恒不变,即每个民族均可以与另一民族自由交往,并可以自由地与之从事贸易。”“自然法

是正当的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本性的理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6]这可能就是当今利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而经济却在不断地全球化这种现实悖论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诱因。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由于指导理论的冲突,现实的全球化是一种存在理论悖论的全球化,其资源配置的规模与范围效益都难以达到最优化,为此,人类需要新兴的全球化。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版本的全球化,它能提高资源配置的规模与范围效益,造福人类。西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加强与临近的南亚次大陆的联系,为中国打开印度洋通道,同时提高世界的全球化水平。

(六)反分裂斗争的需要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把西藏建设成我国同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正在快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距离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西方敌对势力时刻都在对我们进行打压,境内外敌对势力、分裂势力不断制造事端,都在试图阻滞甚至希望中断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西藏作为斗争的最前沿,承受了巨大压力。为了缓解压力,粉碎敌对势力的图谋,就只有化敌为友、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其中最有利的手段之一,就是加强经贸合作,增加共识,减少分歧。为此,西藏提出建立环喜马拉雅经济带,建设中、尼、印经济走廊,中央也把西藏确定为中国通向南亚的重要通道,这都有利于化解南亚区域内国家间的矛盾,争取更多的朋友,在斗争中争得主动权。

二、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解释

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应该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否则就容易“盲人摸象”,出现事倍功半的现象。特别是像“一带一路”这样的新鲜事物,就更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一) 市场经济与规模范围视角

1992年,党的十四大为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而今,我们的任何改革举措都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政府的活动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并要校正市场失灵。所以,我们研究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所遵循的指导理论,就要从更好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入手来开展工作,这其中规模和范围经济理论值得研究。按照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的解释就是:“规模经济可以初步定义为: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而导致的经济。”“联合生产或经销经济是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我使用日益为大家所接受的‘范围经济’一词来指联合生产或联合经销的经济)。”^[7]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初衷,就是欢迎亚欧大陆及太平洋、印度洋相关国家搭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顺风车,就是希望改成一个统一开放的大市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造福人类,这正吻合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理论原理。因此,规模和范围经济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理论支撑之一。

(二)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

“公共产品”概念始于1954年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相关研究,指出了公共产品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产生是国际生产专业化分工过程的衍生物,是国际专业化过程中为了合作和承担分工利益的产物。”^[8]根据联合国有关报告,目前全球公共领域需要集中供给的公共产品包括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基础设施、跨国通信、安全、和平、公共卫生、跨国协调机制和国际多边论坛等。^[9]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官方解释中,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的概括中,绝大部分阐述的都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内容。外交部长王毅在2015年3月23日对“一带一路”进行阐释时指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欢迎各国、国际

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能参与到具体的合作中来。”^[10]如此看来,公共产品供给也是“一带一路”关注的主要问题,其理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也具有积极的支撑意义。

(三) 区域合作视角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由于贸易成本的降低和生产要素的互动,尤其是资本、人力的国际转移能够改变区域资源要素禀赋状况,使经济活动的区位条件得到重新构建。^[11]国内学者认为:“在以往保守的行为体中,经济活动的区位导向是内向的,但在开放的行为体中,经济活动的区位导向是外向的。在这种形势下,边境区的经济功能地位提升,原有的国内核心城市区位对企业和人口的吸引作用相对下降,引发外资、人力、企业从原来的国内核心城市区位转移到边境区位,使整体区位的经济活力对比格局重新变化,跨境次区域合作得以实现。”^[12]西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从经济动因上就吻合了上述理论,就是利用中国版本全球化重新整合区域生产要素的契机,让西藏从经济发展的后方变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前沿,迅速摆脱发展滞后的不利局面,从国内外吸引优势的生产要素,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高地。这样既可以自身实现长足发展,还可为国家融入全球化贡献力量。从区域合作的视角来看,区域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也是西藏融入“一带一路”的支撑理论之一。

(四) 地缘政治视角

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也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产业逐步升级,资金更加充裕,都会面临对广阔市场更为迫切的需求。”^[13]“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策协调和沟通,促进与沿线国家的民间交流,唤醒与周边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挖掘彼此之间更多的文化关联和人文纽带,塑造新的地区认同、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全方位多领域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建构主义认知。”^[14]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众多的历史与人文优势,其同周边国家具有悠久的人文联系,挖掘相互关联的历史相对容易,同周边国家的人民也有诸多共同的记忆,历史上就曾有过经贸文

化交流,如今重新唤起历史的记忆共同进行合作交流,前景美好。这有利于扩大西藏乃至中国面向南亚、印度洋沿岸的大市场,为中国版全球化的发展助力增速。如此看来,地缘政治的有关理论,也应成为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理论。

三、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

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多重目标,近期目标是确保其自身的安全稳定;中期目标是向相邻的南亚国家推广全球化的中国版本;远期目标就是促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寻求经济社会双重安全

受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自冷战结束以来,“西藏的稳定安全一直受到达赖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忽好忽坏。”由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西藏的经济活动也面临巨大的变局,其安全形势也难以像计划经济年代那么可控。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通过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强化区域内国家间的密切联系,实现西藏乃至国家安全形势得到改善。同时,通过融入国际与区域的分工合作,实现西藏与国家的经济安全。

(二)支撑国家的绿色发展目标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并且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西藏有全球独具特色的高原生态环境,而且已经形成具有可持续特点的高原生态链,保持其完整性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由于西藏周边多为不发达国家,近年来在启动发展的进程中对生态的考量不够,导致西藏生态环境出现受损的迹象。如果西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就能带动周边欠发达国家一起发展经济,实现社会进步,环喜马拉雅的生态环境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三)凝聚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

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除了加强对外开放以外,还会强化与祖国内地的经贸人文往来。文化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一个行之有效

的创举,已经为几千年来的民族国家发展实践所证明,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大力强化与中华各民族的认同感,很好地实现交往、交流、交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融入全球化中国版的发展潮流

“一带一路”不仅是一种经贸行为,也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一种人类智慧,是全球化的中国版本。中国版全球化与现行西方版全球化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不赞同西方全球化指导理论中的核心——边缘、中心——外围、起源——非起源的不平等的全球观,坚持边缘——非边缘、核心——非核心、起源——非起源的中华民族全球观,愿与相关国家一道,共同建设“一带一路”。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利用人类转向全球化中国版的契机,实现根本性的转变。西藏将从经济发展的后方,转变为中国面向世界发展经济的前沿。

参考文献

- [1] 李曦辉. 全球化中国版之“一带一路”支撑理论研究[J]. 区域经济评论, 2017(6).
- [2] 孙勇. 西藏与邻省藏区稳定研究视域与思考[J]. 四川大学学报, 2015(1).
- [3] 刘宗义. 西藏融入“一带一路”的国际挑战与战略选择[J].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17(1).
- [4] Tibet: An Ancient Threat to Modern China[J]. July 16, 2015, <https://www.startfor.com/>.
- [5] [12] 柳思思. “一带一路”: 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J]. 南亚研究, 2014(2).
- [6] [荷] 格劳修斯. 论海洋自由, 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M]. 马忠法,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7] [美] 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M]. 张逸人,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16.
- [8] 黄河. 金融发展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J]. 当代经济研究, 2005(4).
- [9] 吴志成, 李金潼.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视角与实践[J]. 政治学研究, 2014(5).

- [10] 王毅.“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 [R/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3/23>.
- [11] 参见 Paul kergman,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1-2.
- [13] 黄琪轩,李晨阳. 打过市场开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5).
- [14] 钟飞腾. 超越地缘政治的迷思:中国的亚洲新战略[J]. 外交评论,2014(6).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of Tibet's Integration in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 Ling-y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ibet'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forms to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ibet's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should also have its own guiding theory, and properly apply scale-economy and scope-economy theories to improve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public goods theory to overcome market failure,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the geopolitical theory. Tibet's integration in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imed at achieving multiple goals, such as the dual securit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green development, the divers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Tibet;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ory; Reality

[责任编辑:阿贵]